



世纪文库

殷墟陶器研究

李济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殷墟陶器研究

李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墟陶器研究/李济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208-06785-1

I. 殷... II. 李... III. 陶器(考古)-研究-
安阳市-商代 IV.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4422 号

责任编辑 虞信棠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殷墟陶器研究

李 济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江杨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9

插 页 4

字 数 254,000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785-1/K·1299

定 价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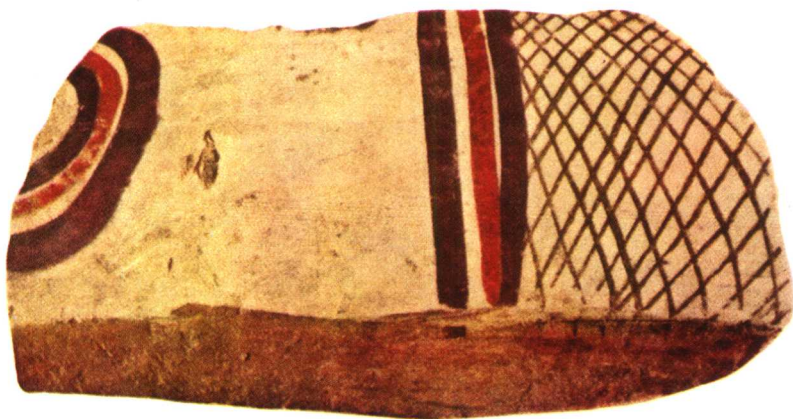
1929年秋季，殷墟第三次发掘工地上获得唯一一片彩陶时的情形



有盖的白陶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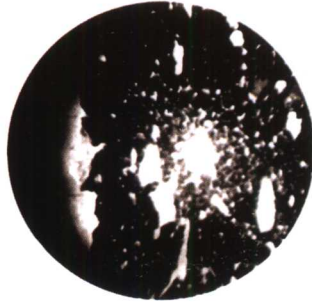


釉陶罐



彩陶片（1929年11月21日出土）

陶质显微镜放大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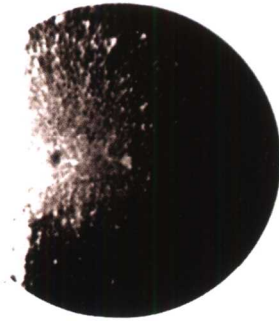
A

A.(mb) × 25

组织粗糙，外层釉质不见；内层釉质破碎，平均厚度0.2mm。

白色大块晶形完整者多为长石，偏光显微镜下显示干涉色，屈折率不高，常与石英互生。

黑色细粒者则为高岭土，组织间殊少孔隙，想见其当时温度甚高，而变化较缓。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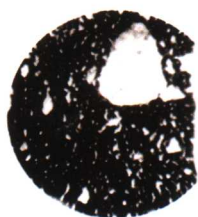
B.(3.13.0324) × 25

组织细密，内层釉质不见；外层釉质完整，平均厚度0.1mm。

白色晶形完整者多为长石。

黑色细粒者多为高岭土，组织间多孔隙，想见其当时温度变化甚遽。

陶质显微镜放大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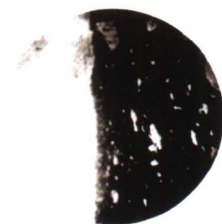


A

A. X × 20

白色者为石英晶粒；间有微小之
长石晶体，惟边际呈熔化状，黑
色者为瓷质。

据 Clarke: Data of Geochemistry 中所载, Joly, Cusack, Doelte, Brum, Day, Brown 等测验长石之熔点约为 1200°C—1500°C 许；石英之熔点约为 1400°C—1700°C ±。但 Clay 中 Na₂O, K₂O, CaO 等，皆为熔剂 (Flux)，可使长石熔点降低，故烧制此等瓷器之温度当在 1000°C 左右。



B

B. n × 20

白色者为石英晶粒；间有微小
之长石晶体，惟边际呈熔化状，黑色者为瓷质，边部透明者，为釉料，厚度约 0.15mm—0.3mm。



C

C. 1/384 × 20

白色粒晶状者为石英体，扁长
状者为气孔，长石多不能辨
识，黑色者为瓷质。



D

D. 3.13.0324 × 20

灰色带釉，大连坑，十八年，十二月
十日。气孔甚多，白色微小者为石英
晶体，黑色者为瓷质。



E

E. 3.13.0298 × 20

白陶片，大连坑，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气孔甚多，白色微小者为石英晶体，黑
色者为瓷质。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本书出版说明

本书是李济先生研究殷墟陶器的力作。这部著作的前身，是李济先生撰写的《殷墟陶器研究报告》。据李济先生在这本报告的序言中所说：“这本报告分为上下二辑：上辑是一种分析性的描写，报告材料本身的性质；下辑报告陶器在地面下之分布情形及其历史意义。”1956年，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这本报告的上辑名为《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收入《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予以出版。是书，收入本社于2006年出版的五卷本《李济文集》（第三卷）。

诚如李济先生所说：“陶器的研究在现代考古学内有它的重要地位”，“这一类的材料在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重要性，其重要的程度决不低于研究任何其他区域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及文字开始时代的文化所包括的陶器！在两河流域，在埃及，在爱琴海以及中欧与北欧，在新世界的中美、南美与北美，各区域的考古家差不多都把这类材料整理到了可以通俗地应用的程度。但在中国咧，我们真惭愧得很，连搜集的工作尚滞留在原始的阶段！因此，殷墟的这批材料更显得重要了。”李济先生在谈到殷墟陶器研究的意义时，还说：“根据这些实物与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与史前文化的若干关系；我们并可以看出不见于文字记录的殷商文化中的若干新成分”。

对于殷墟陶器的研究，李济先生投入了毕生精力，不仅在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后、抗战爆发始，对殷墟出土的二十四万七千余片陶片、一千五百余件可复原的陶器，以及极为珍贵的全部发掘原始记录，作了妥善安置和转移，而且在研究所不断转移、工作条件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断断续续地研究，并取得成果，对殷墟陶器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殷墟陶器图录》，就是在研究所迁至四川李庄后绘制成功的。尔后，李济先生对殷墟陶器作了长期研究，《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就是这一研究的

权威性成果。

李济先生的这部著作，除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和收入《李济文集》外，迄今尚未单行出版(其中的第二章，原为写于1940年的《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曾于1952年在《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中发表)。为满足研究工作者和对此有兴趣的读者的需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将本书列入“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依原报告名，定书名为《殷墟陶器研究》，予以单行出版，以飨读者。

本书以2006年版《李济文集》为底本。李济先生哲嗣李光谟对全书作了仔细校订；出版前，对全书的文字、注释、图表等也作了规范处理。

序*

1926年的冬天，我与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了一处彩陶遗址，共作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发掘的收获，大多数是破碎的陶片，石器骨器等只占很小的成分；实物的全部共装了七十余箱。当时我们就决定把全部采集品，运到北京研究，雇了九辆大车，每一车的动力都是由五匹至七匹骡、马与驴子配合的。这一壮盛的运输队，自夏县启程，走了九天方到达正太铁路的榆次站。如此大量货物的运输引起了不少的谣言；省政府的当局有点不放心，就派人在榆次县的关口检查了一次。检查员所看见的第一箱是破碎陶片，第二箱是破碎陶片，第三箱还是破碎陶片！他们有点不耐烦了，就问我们道：“你们花了这些钱，运这一堆货物到北京，难道说都是这些破砖乱瓦吗？”（这是检查人员对于陶片所用的名称；考古家绝对不认可的。“砖”与“瓦”都是在殷商以后方在中国出现的文化成分）。我们答道：“都是一样的，请你们每一箱都打开看就是了！”他们听了，虽说有点信不过，却心灰意懒地摇摇头，也就不看了。看样子，他们总觉得我们作的这件事有点荒唐、滑稽，近乎疯癫，不可以常识理论。于是将信将疑地让我们过去了。第二天装火车，抬箱子的苦力们觉得箱子既是如此地沉重，里边必定有宝贝，不免纷纷地议论。同时他们也知道，检查人员已经把箱子翻过了不少；若有宝贝，他们决不会轻易地让这批货物通过。他们不大懂为什么这些重的箱子，可以如此随便地放走！正值这些工人七嘴八舌讲到热闹的时候，有一位在火车站工作的自命不凡的站员，就出来向这些怀疑的工人们讲：“这些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京后就要化验；化验后就可提炼值钱的东

* 本文曾以《〈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为题，收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的《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下册）。

西出来。……”如此地，这一位站员先生就把这一群劳苦群众打发了。我没再遇见这位替我们排忧解难的朋友。他说的那些话，无论是出于急智，或真相信它，在我个人的回忆中是带有刺激性的。三十年的经验使我感觉到，“提炼”这两个字也许是说明这一研究工作甚为适当的语句；不过所“提炼”的却没有“值钱的东西”，而只是若干不能以钱估计的准确知识而已。

陶器的研究在现代考古学内有它的重要地位，理论上一般的说法用不着我在此处饶舌；我想在此处加以说明的为这一类的材料在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重要性，其重要的程度决不低于研究任何其他区域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及文字开始时代的文化所包括的陶器！在两河流域，在埃及，在爱琴海以及中欧与北欧，在新世界的中美、南美与北美，各区域的考古家差不多都把这类材料整理到了可以通俗地应用的程度。但在中国咧，我们真惭愧得很，连搜集的工作尚停留在原始的阶段！因此，殷墟的这批材料更显得重要了。

太史公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他写《五帝本纪》只是就若干学者的称道及孔子以来的传说，择其“言尤雅者”作一记录。但是黄帝以前咧，似乎连那“不雅驯”的传说也没有了！这是根据文字记录作历史的必然限制。没有文字的历史，只靠传说，更远的过去，连传说都追溯不到了，只有依据想像中的神话了。这一情形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所有远古文明的开始，各有同样的经过；史学家现已接受这一说法。神话与传说，都是太史公列在“不雅驯”种类的材料，不肯随便采用。就史学的立场说，这应该视为太史公留下来的一种良好的传统。

没有文字的历史是一个现代的观念；在中国区域，这一观念的发展尚到不了五十年，而“中国远古文化”之发现，是由一位欧洲学者的工作引导出来的！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组织田野考古工作时，华北一带虽已发现了若干史前文化的遗址，但是这些没有文字的早期中国文化与中国有文字的记录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却

煞费猜想。殷墟田野工作开始后，由发掘所得的有文字的材料，把上古史的传说性质的材料点活了，把《殷本纪》的大部分记录考信了。与有文字的材料并着的，没有文字的实物出土后，把华北一带新发现的史前遗存联系起来。发生前一作用的材料，以有文字的甲骨为主体；同时也有若干有文字的其他实物，虽是比较地少见，却是同等地重要。发生后一作用的殷墟材料，虽包括一切出土的实物，但实以陶器为最主要。陶器所以如此重要，因为这项资料，具有他项实物不常同时兼备的三样品德：(1)数量多；(2)在地下保存可以历久不变；(3)形制质料随时变化，变的部分均足反映时代精神。用这三个标准衡量殷墟出土的陶质材料的历史价值，我们寻到的是：就它们的作法，形制，以及文饰论，它们与华北一带所出现的史前陶器，在很多方面可以联系起来。殷墟陶器上所刻划的符号文字以及若干雕成的花纹，又与殷墟出土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及青铜器，表示亲切的关系。故这一发现使我们，第一次地，能把华北史前文化最后的一段，与中国境内所找到的历史文化最早的一段，归纳成一种有科学证据可证的，脉络贯通的系统。但所以能得到这一结论的，又大半靠这批材料的记录与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在田野与室内的若干节目，今依次解释如下：

这一组将近二十五万块的陶片以及一千五百余件可复原形的陶器所具的历史意义，靠着下列的三种记录与研究：(甲)出土时的记录及它们在地下的原在情形，以及所在地的地层与其他地层的相对位置。(乙)与同时同地层或墓葬出土的他种器物的关系。以上两项记录包括发掘时的记载，照相及图录：——这些都是断定它们历史价值之原始证据。(丙)它们的质料、作法、形制以及文饰的研究，为出土后的几种基本工作。有几项研究更需要其他专门的技术帮助。譬如陶质的化学分析，就必须送请化学分析家鉴定。七七事变以前，这类的合作，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内已是一项正常的业务；地质研究所替我们作的第一次陶器质料分析就是一个例。但是到了抗战时代，这种合作的业务就大受限制，终于不可能。我们在昆明时期又送了一批陶片请化学研究所

代为化验，卒因化验材料的缺乏，未能完成；以后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本报告讲陶器质料的部分所根据的化学分析，仍是第一次请地质研究所化验所得的结果。

战事带给我们的灾害，是不宜于在此处申诉的；不过对于这一普遍而持久的变乱，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工作部分，我们确有留一记录的义务。抗战时代，史语所在大搬家的时候，虽带走很多的考古标本，但陶器却没占甚重要的地位。没带走的陶器标本，留存在三个地方：安阳的冠带巷，北京的蚕坛，南京的北极阁。随着研究所流浪的，只限于考古人员习常说的“形制代表标本”(Type specimens)；这一项目，是在作类别工作时检选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代表，大半均见于本报告内的图录与图版。白陶、釉陶、有文字符号以及有特样文饰的陶片大部分都跟着机关迁移了；但是因为运输的困难，迁徙无定，这些宝贵的标本也免不了有遗漏的。只有全部的原始记录始终跟着我们走，没离开我们一步。

根据这些原始记录以及若干代表标本，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抗战期间就断断续续地作下去；我说“断断续续地”，因为我们的移动是不能预先计划的；所以往往一段将近完成的研究，因忽然奉命迁移而中断；这一研究可能永不完成；可能要隔一个长久时期方能继续下去；可能原工作人改业了或者死了，要换一个新人来作！像这样的情形可以说是战争时间的一种常态；但就研究工作说，工作的损失是没法子估计了，时间的损失就更不必说。不过我们仍完成了研究计划中的若干节目。

在昆明的一个时期，第二次作陶质化验的尝试虽失败了，但在别的部门却得了些成绩：一为吴金鼎博士所写的可复原形的及完整标本的作法，形制与文饰之说明；一为石璋如先生对于昆明窑业之调查。后一调查为了解殷墟陶业之一帮助。同时，关于陶质之物理的实验——如吸水率，硬度等也获得了若干进步。统计表的整理，田野号的调整以及图录的安排，与序数的编制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算是有了一个较长久的安定时期；这一时期完

成了序数的编制。最后所采用的编制方法，虽是很简单易晓的，却是经过了一段长期的实验与不少的改正方达到的一个阶段。编制内的第一标准之选择——即以容器底部的形态作类别形制的基本标准——为全部编制工作一个划时代的决定；有了这一决定，编制工作方顺利地完成了。按照这一编制方法，殷墟出土的一千五百余件全形及全形可以复原的陶器都可纳入这一系统；在系统内的每一式，每一型，都有了一个固定的名称。这些名称听来虽没有《考古图》、《博古图》所用的名称那样的典雅，却也没有那样浑沌的含意；每一名称都有一个图样替它作界说；这一名称，在本报告内统称为“序数”；这是借用围棋谱的一个名词；考古同仁喜欢这一名词，在此处用得适当，已有普遍采用的趋势。

每一序数的每一图样，均将所绘标本的轮廓，结构与文饰表现出来；因此报告中的十六幅图录序数排列了殷墟陶器群的各式各样的全貌：此一编排为上辑中最扼要的一篇。

这实在是一件很艰辛的工作；其中有些决定是经过很热烈的讨论方才得到的。盘旋在编制人心中最久的一点为下一项事实：小屯地面下的文化遗存，虽以殷商时代留下来的为中坚，但地层的秩序与实物的包含均证明了先殷文化的存在；故小屯出土的陶器——显然晚期的自然除外——很清楚地不是全体都为殷商文化的产物。编序数的一个大问题为：应否把殷商时代与先殷时代的陶器分开处理？最后的决定却是把这两个时代的陶器合在一起编。我应该在此处把作这一决定的理由说明。

小屯地面下先殷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层次可以划分得清楚的只居少数。大部分的地层都被后期扰动了或毁坏了，所以我们虽能根据未扰乱的地层断定先殷陶器若干形制，但并不能划定全部先殷陶群的范围。先殷时代的陶群既不能在地层上全部勘定，殷商陶群的范围也就被牵涉了同样地不能划定。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不能分开解决的。地层上既无帮助，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先将陶器在地面下分布的情形，先

作一研究，以有层秩可寻而扰乱最少的坑位所包含的实物为基础追寻那在地下堆积的先后秩序，再决定两个时期的分别。但是，研究如此大量的陶器在地下分布的情形，所需要的不但是耐性的排列，更紧要的是细致的分析；而分析的初步自应从形制的类别着手，这又转到序数编制的问题上去了。换句话说，先殷陶器的全部与殷商时代陶器的全部，两组的分别并不能在小屯地面下的地层中完全划分；三千余年的翻土工作，在很多的方面把历史的秩序颠倒到了一种不可认识的程度。现在我们要恢复这一秩序，我们必须按照所有这两期的陶器在地面下分布的情形分别论列，重建每一组或每一形制的个别历史，然后才能复原这一段历史的全貌。为实行这一研究计划，最有益的开始还是把全部殷墟陶器——包括先殷与殷商两个时代——编成一本图录，然后按这些标本的组别再分析它们的分布及其历史。

但在讨论陶器的各式形制之时代性以前，各器物形成的结构基础及其附着之文饰尚需要若干详细的研究；如此我们方能更进一步的了解：(1)外形与结构之关系；(2)形制与文饰是否有联系性；(3)制造方法对于形制之影响以及(4)每一器物各部结构与形制之相互关系。以上各种不同之关系，一经分析，都是错综的，不一律的；有些似甚固定，大半显着不常。这些变化多半反映时代的演变；如何把这些形制的变易扣入时代不同的期限内，就成为这一报告要讨论的一章最大的课程。

这本报告分为上下二辑：上辑是一种分析性的描写，报告材料本身的性质；下辑报告陶器在地面下之分布情形及其历史意义。国家经过了一次生死存亡的斗争，原来计划中的若干节目未能完全实现；故按照我们自己所悬的标准，报告的内容实有若干不全不尽的地方。譬如陶质的化学分析，数目不够，前已提到了；此外尚有若干别的实验工作，我们屡次想作而没能作到的。照相一项，尤使作者感觉遗憾。在大播动的时代，史语所虽尽了最大的力量将所需要的照相材料带走，但若干比较笨重的设备，是绝对地超乎史语所所能得到的运输能力；于是这些非常有用的工具，都送到香港去存放了。故在昆明与李庄两个时期，